

# 转型与博弈:1950—1966 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

刘 宇

[摘 要]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原为太庙,曾经是明清两朝皇家祭祀场所,平民禁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其被赋予了革命化的功能,主题为“劳动人民的乐园”。北京各阶层市民进入其中,娱乐联欢、政治游行成为这一时期的主题。让封建时代的国家象征承担起这一功能,意在留下一个强烈的象征符号,即彰显统治阶级已经翻转,人民开始当家作主。作为劳动人民的文化宫,它不仅成为新中国的物化载体和权威象征,而且被营造成公共仪式的空间。与此同时,作为古迹的太庙,在面临频仍的活动、接踵的游人时,愈发不堪重负,二者矛盾逐渐凸显出来。

[关键词] 北京太庙;古迹;文化宫;革命化转型

[中图分类号] K26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583-0214(2018)12-0064-10

随着辛亥革命的爆发,清政府退出了中国历史的舞台。北京作为曾经的帝都,皇家古迹俯仰皆是。如何处理清廷的“政治遗产”,成为民国历届政府需要面对的问题。在时局震荡、政权频繁更迭的状态下,这些古迹大多乏善管理或趋于闲置。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这些古迹得以重获新生。

同时亦应看到,古迹被新政权接收后,其日后命运却各不相同:如城门、城楼、牌楼的逐年拆除并最终消失,如皇史宬、国子监、太庙等另做他途。这些在改变北京城市面貌的同时,也彰显出新政权“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的强烈意愿。

目前学界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古迹状态的研究,讨论、反思已拆除古迹的文章和回忆录居多<sup>①</sup>;讨论古迹转型及利用的文章较少,研究尚不充分<sup>②</sup>。而后者显然较具现实关怀。因此,本文拟以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太庙为个案,利用档案、报刊等相关资料,探讨古迹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进行革命化利用的过程与所蕴藏的政治意涵与现实张力。

## 一 太庙的转型

太庙始建于明代永乐十八年(1420年),根据古代“敬天法祖”的传统礼制,是皇家祭祖之地,不允许平民进入。辛亥革命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中“皇室的宗庙陵寝,永远供奉”的条款,太庙一度归清室所有。1924年北京政变后,国民政府将此地辟为和平公园。由于经营不善,资金短缺,致使太庙破败失修,杂草丛生,游人寥寥,处于半开放状态。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天安门被赋予了新政权象征的意涵,由此,天安门周围景观开始了一系列改建和重构——扩大的广场,拓宽的长安街,大气的观礼台,宏伟的纪念碑,庄严的人民大会堂成为此地的新风貌。中央政府接管了太庙,对其中建筑进行了修整和油饰,初显当年风貌。经时任总理周恩来提议,政务院批准,将该地作为以劳动人民为主要服务对象、具有公园和俱乐部双重性质的市民

① 参见瞿宛林:《论争与结局——对建国后北京城墙的历史考察》,《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1期,第62~71页;《“存”与“废”的抉择——北京城墙存废争论下的民众反应》,《北京社会科学》2006年第6期,第20~25页;孔庆普:《城,我与北京的八十年》,北京:东方出版社2016年版。

② 参见高建国:《关于中国文物古迹保护、研究和利用的思考与建议——以北京中南海为例》,《2009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论坛暨中国可持续发展研究会学术年会论文集(下册)》,《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编辑部2009年版。刘宇:《娱乐与革命——1950—1966年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江苏社会科学》2013年第5期,第163~169页。

文化活动中心——其全部“工作人员共 190 人,其中干部 44 人,工勤人员 146 人。文化宫设主任一人,副主任二人,下设宣传科、文艺科、文化休息科,图书馆,人事保卫科,总务科,另外直接领导北京市工人俱乐部”<sup>①</sup>。

1950 年国际劳动节前,该地正式对外开放,毛泽东亲笔题写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匾额高悬于正门之上。该名称反应出中央政府通过此园灌输政治理念的心愿。

文化宫的功能决定了文化宫活动的内容,而活动的内容又决定了宫内场所的设置。由于文化宫在向工人提供宣教的同时,还具有提供娱乐的功能,因此文化宫拆改了部分古建筑,并将主要殿阁的功能进行重新规划。很明显的是,在总计 16 处场所中,文艺活动场所有 8 处,占 1/2;体育活动场所与学习场所各 4 处,共占 1/2。这种设置的初衷,既是“寓教于乐”宗旨的体现,又是工人和普通市民的实际需要。

表 1 文化宫内部场所设置<sup>②</sup>

场所	数目	原用途
文化休息厅	1 座	
艺术厅	1 座	后殿
艺术活动室	4 座	后殿东西庑殿
图书馆	1 座	治牲房
技术研究室	1 座	神厨
讲演室	1 座	神库
儿童阅览室	1 座	
儿童游乐场	1 座	
剧场	1 座	
乒乓球室	1 座	前殿西庑殿
棋艺室	1 座	后殿
体育场	1 个	
文化园	1 处	

至于为何将太庙改作劳动人民文化宫,笔者认为,此举不单是出于该园地理位置的特殊,更是出于其蕴含的政治意义。时任全国总工会主席李立三曾这样阐释:“这说明我们工人阶级真正翻身了。劳动人民所创造起来的文化,却被反动统治阶级剥夺了,专为他们所享受、所霸占。正如太庙,原为劳动人民修建起来的,一修好后,劳动人民根本就不能进来了。今天革命胜利了,现在我们又能把原来专为剥削阶级服务的文化变为劳动人民自己享受的文化,而且还要把劳动人民的文化,发展起来。”<sup>③</sup>从太庙到劳动人民文化宫,不仅体现出工人阶级在政治和文化上的优越地位,更是揭橥了由政权变更而引领的政治话语的转换。

劳动人民文化宫是政府开展政治宣传和教育的重要阵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面对尚未完全解放的领土、严峻的国内经济形势以及稍后突然爆发的朝鲜战争,中央政府需要做大量的鼓动工作来振奋士气和聚拢人心;面对复杂的市民阶层、百废待兴的工业,中央政府同样开展教化来整合市民的思想和提高工人的生产技术。与此同时,各阶层市民也需要一个空间来了解政权话语并改造自己,因此,文化宫成为彼此沟通互动的平台水到渠成。

<sup>①②</sup> 《北京的文化馆》(文化宫部分)(1961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12-00870。

<sup>③</sup> 《文化宫昨举行开幕式 李立三的讲话》,《北京新报》,1950 年 5 月 1 日,第 4 版。

## 二 人民文化宫:功能与利用

### 1. 丰富多彩的文艺活动

作为服务于政权的宣教机构,文化宫试图将各种政治内容与国家建设的主题融入和编织于一般的文体活动中,力求发挥其寓教于乐的功能。歌曲与舞剧的表演也被赋予了新时期歌颂党、歌颂新中国、鼓舞市民建设热情和创造新生活的内容,由于“传统娱乐”已深入人心,市民喜闻乐见,因此也是文化宫娱乐活动的重要组成。同时,文化宫还精心营造出一种“剧场”氛围,使市民在参加文娱活动时,不自觉地被带入其中,目的是最大限度地争取市民的参与和认同。

劳动人民文化宫被改造之初,就有媒体指出,文化宫应成为城市工人阶级的“工宣队”,一方面为丰富工人的业余生活,并从中汲取创作灵感;另一方面发掘其中的文艺骨干,将其培养成积极分子,配合文化宫的宣传。“事实证明在工人同志中,有很多是天才艺术的,他们只要加工学习,便是很有前途的作家、艺术家、科学技术家……使他们在文化宫中学到东西,在娱乐方面也要注意通俗大众化的愉悦,比如象棋围棋,故事讲座,连环漫画、说大鼓、说快板等都是工人同志中所熟悉的娱乐形式,通过这种形式,贯穿一定的深沉意义,使工人同志不但玩了,而且也可以学到东西。”<sup>①</sup>

文化宫举办了一系列娱乐活动,如舞会、音乐会、各种专业剧团的演出和工人业余文艺汇演等。在举办娱乐活动的同时,也举办了各种文艺学习班,计有“文学评论组、美术组、曲艺创作知识班、工人业余艺术团、职工业余朗诵小组等”<sup>②</sup>。

劳动人民文化宫每月举办工人业余文艺演出两场至三场,参加演出的是各厂、矿、区工会的业余文艺活动积极分子和歌舞队员,有时由一个单位独自包揽一场晚会的节目,有时则采取两三个单位联合演出的办法。据统计,1955年“自七月二十一日至九月十二日,这样的演出共举行了六场,观众共四千多人,除少部分观众是机关工作人员外,百分之九十以上是职工群众”<sup>③</sup>。

客观地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较长的时间内,工人和市民参与文化宫活动的热情还是相当积极的。各工厂工会也是积极配合,因此节目还是比较丰富多彩的。在演出的节目中,北京邮局演出的京剧“四进士”,园林局演出的评剧“茶瓶计”,在东六里屯砖瓦厂演出的民间器乐合奏“小放驴”“黄鼠狼养鸡”,某工厂演出的舞蹈“柴郎与村女”,民歌对唱等,最受群众欢迎。

不单是文艺演出,劳动人民文化宫为提高广大市民的音乐欣赏水平,还曾连续举办了15次音乐讲座。在这15次讲座中,一半以上是介绍外国和古典作品的,如俄国名作曲家柴可夫斯基、格林卡等人的作品,德国古典音乐家贝多芬、天方夜谭交响乐等唱片<sup>④</sup>。这种高雅艺术的宣传推广活动,无论是在提高市民音乐欣赏水平,还是在陶冶市民情操方面,都有其积极的贡献。

除文艺演出和音乐、创作辅导外,美术辅导也是文化宫的一项重要内容。劳动人民文化宫举办了美术训练班,包括素描、油画、美术创作、实用美术等,还将继续开办国画、版画两个班。这些训练班是在中央美术学院和中央工艺美术学院辅导下进行的<sup>⑤</sup>。在工人已然成为名义上的统治阶级的情势下,作为向其提供休闲娱乐的公共空间,劳动人民文化宫在动员社会各界支援与配合方面,无疑具有天然的优势。

1960年春,“大跃进”正酣,为配合形势,歌颂“大跃进”取得的成绩,文化宫还举办了工人和诗人的赛诗会,会上“诗人”们争相抒发自己的情感,人民印刷厂工人高占祥唱道:“跃进大船破巨浪,祖国一日万里航;舵手是咱毛主席,神仙翅膀赶不上。”诗人放平和诗一首:“无产阶级大手笔,争分夺秒创

① 《对劳动人民文化宫几点希望》,《北京新民报》,1950年5月3日,第5版。

② 《北京的文化馆》(文化宫部分)(1961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12-00870。

③ 《文化宫举行小型业余文艺演出》,《北京日报》,1955年9月23日,第3版。

④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关于进一步贯彻党的社会主义文艺革命的方针——整顿市、区(县)产业文化宫、俱乐部干部思想作风的请示》(1964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214。

⑤ 《文化宫举办美术训练班》,《北京日报》,1960年1月10日,第3版。

奇迹；万紫千红吟佳句，句句歌颂毛主席。”工人李玉林写下了工人过春节不忘节日生产迎接开门红的心情：“锣鼓交加爆竹声，红旗招展伴红灯，工人争写大字报，保证节后开门红。”<sup>①</sup>从样式看来，这种诗歌多属打油诗，并无多少艺术感可言，甚至与口号无异；从内容上看，其大多以歌颂党、歌颂领袖、歌颂“大跃进”以及“三面红旗”为中心。通过劳动人民文化宫精心营造的“剧场”效应，即使是平时读书甚少、甚至识字不多的工人或者普通市民，也都难免跃跃欲试。在一定程度上，作的诗越多，说明其参与的态度越是积极，即使不会作诗的市民，在此时也会迸发出“吟诗作对”的冲动和欲望，因为要用行动来证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

此后，随着政治空气的愈发严峻，文化宫也受到影响。1964年，由北京市总工会召开的关于市、区（县）、产业文化宫俱乐部文艺工作会议指出：许多同志对“文艺在阶级斗争中的作用，对阶级斗争在职工业余文艺战线上的反映认识不清，自觉或不自觉地把职工业余文艺活动看成是‘玩玩乐乐的事’。”会议通过所谓“大讲、大揭、大议”阶级斗争，使参会者意识到：文艺是从属于一定阶级和一定政治路线的，不为无产阶级服务，就要为资产阶级服务，不可能有什么超阶级的“无益无害”的文艺；职工业余文艺必须为“兴无灭资”的斗争服务，否则阶级敌人就会以此向我们进攻，进行“和平演变”，为资产阶级复辟开路。有的同志说：“白天厂里进行社会主义教育，晚上俱乐部（文化宫）宣扬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白天让职工鼓干劲，搞建设，晚上唱‘到处流浪’；白天宣传破除封建迷信，晚上演鬼戏，过去我们没有察觉这个问题，现在看来，这实际上是和党的方针、政策唱对台戏，对社会主义建设只起破坏作用。”有的说：“过去对演鬼戏、坏戏、搞舞会、映港片，也觉得不好，但没有认识到这是阶级斗争。要像现在这样明确，说什么也不那么搞了！”<sup>②</sup>

1965年，“文革”前夕，北京市弥漫着紧张和严肃的“革命”气氛，铺天盖地的标语、红旗遍布在北京的街头巷尾，使人目不暇接。接踵而来的文化批判、论战使人疲于应付。毫不夸张地说，此时的北京，已然把自己改造成运动的“剧场”，“舞台”布置已就绪，“观众”正在进场热身，文化宫则正在进行着“文革大剧”前最后的动员和演练，为防止市民因“靡靡之音”而心生旁鹜，文化宫将“革命娱乐”作为唯一的主题和符号，其他剧目和活动禁止上演。此时期上演的一切节目，举办的一切活动，都与“国家话语”息息相关：“文化宫是从今年八月份起试办革命现代京剧优秀选段教唱活动的，两个多月来，参加的有三千二百多人次。不少人学会了《红灯记》中唱的《浑身是胆雄赳赳》、李奶奶唱的《要坚强的像铁打金刚》、铁梅唱的《打不尽豺狼决不下战场》等五段唱腔。”<sup>③</sup>

1966年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提出“要彻底破除几千年来一切剥削阶级所造成的毒害人民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在广大人民群众中，创造和形成崭新的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sup>④</sup>。这段话在正式界定“四旧”“四新”的同时，还将民间喜闻乐见的传统、文化、习惯归为牛鬼蛇神一类，加以批判和禁止。

纵观1950—1966年，文化宫所进行的文艺活动，逐渐由娱乐化转向革命化。这种转变，折射出市民需求与政府意愿之间的此消彼长。1950—1961年间，传统娱乐与革命娱乐尚能和谐共处，文化宫在进行革命娱乐的同时，显然也注意到“聂隐娘”“吕洞宾戏牡丹”等后来所谓的“鬼戏”“坏戏”更能满足市民猎奇和放松的心态，一定程度上迎合了市民的需求。因此这一阶段文化宫的文艺活动同时具有教育功能和娱乐功能。政府对此也并未干涉，甚至在“自然灾害”期间为缓解市民的饥饿感，允许部分香港片和东欧片在文化宫播放。而1962—1966年间，革命娱乐逐渐发力，排他性愈发强烈，使上述两者以往在文化宫和谐共存的局面被彻底颠覆，取而代之的是“革命娱乐”的大行其道。仅从1965年文化宫所举办的活动中即可窥见一斑。

① 《佳节赛诗会高唱迎春歌 工人、诗人在文化宫欢聚赋诗》，《北京日报》，1960年2月5日，第4版。

② 《北京市总工会党组关于市、区（县）、产业工会文化宫、俱乐部文艺工作会议的报告》（196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224。

③ 《让革命现代京剧在群众中传播》，《北京晚报》，1965年10月16日，第4版。

④ 《横扫一切牛鬼蛇神》，《人民日报》，1966年6月1日，第1版。

## 2. 广泛参与的体育活动

经过连年的战乱与社会动荡,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人民生活水平较低,身体素质差,当时中国人的平均寿命仅有 35 岁<sup>①</sup>。增强人民体质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项重要任务,中央政府决心通过全民性的体育运动,来提高人民的体质和体育竞技水平。市民体育活动的开展也就成为了当时党团结人民、关心群众生活,富国强民事业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开展的市民体育活动也就明显被烙上了时代的印记。如同其他的市民文化活动一样,市民的体育活动也包含了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通过开展体育活动,来提高市民的身体素质,丰富市民的业余文化生活;另一方面,由于体育活动具有集体性、拼搏性等特点,它也就成为党激励与鼓动市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途径,“开展职工群众体育工作。体育是共产主义教育的一部分,只有加强这方面的工作,才能培养出健康的、乐观的、能够积极地从事社会主义劳动,和勇于保卫祖国的新一代工人”<sup>②</sup>。

1952 年 6 月 10 日,毛泽东主席为即将召开的中华全国体育总会第二届代表大会题词“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还指出了体育锻炼的根本目的是增强人民体质。1954 年在毛泽东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讨论和批准了《中央体委关于加强人民体育运动工作报告》,并批示指出:“人民的体育运动是国家的一项新的事业……使群众性的体育运动首先在厂矿、学校、部队和机关中切实开展起来。”从 1952 年 6 月 10 日开始,“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题词成为了我国体育工作的方针和任务,本着“锻炼身体,保卫祖国”的朴素理念,市民性体育活动在崇高革命理想的号召与激励下掀起了高潮。

为了推动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文化宫经常组织工人篮球队、排球队、体操队下厂作示范表演和比赛活动,如 1953 年工人业余篮、排球队和工人业余体操队下厂表演达 26 次,观众 31 600 多人。通过这些表演和与当地职工开座谈会交流经验等活动,带动了基层体育活动的开展,“工人业余体育活动组织,从 1951 年开始建立职工篮球队(3 个),发展到现在,有工人篮球、排球、足球、体操等男女队共 9 个,队员有 143 人,并经常参加在文化宫举办的比赛和下厂做示范性表演活动,他们差不多也都成为本单位体育活动中的骨干分子。”<sup>③</sup>

不仅下厂示范,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还专门开辟运动场,“并每逢周三、周六和周日,在晚七点半都举行球类比赛,每次有一两千人参加”<sup>④</sup>。此外,文化宫还开展了全市工人篮球和排球活动,提高工人身体健康水平和劳动生产率,如在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体育场举办全市职工排球比赛大会等<sup>⑤</sup>。

1953 年,苏联体育代表团来北京做体操表演,北京市各界人民特别是运动员、体育工作者都期望能得到参观和学习苏联先进体操经验的机会。为了响应广大市民和相关人士的要求,劳动人民文化宫还特地举行了一场体操表演<sup>⑥</sup>。由此,体操成为一项市民喜爱的运动项目。为推广体操运动,培养基层业余体操人才,文化宫还举办了工人业余器械体操干部训练班,“训练班第一期已在九月十日开学,每星期二、四晚上课,预定训练期是三个月,训练内容有双杠、单杠、跳箱、垫上运动四项,参加训练班第一期有本市各厂工人一百七十多人。”<sup>⑦</sup>

① 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育的地位与价值研究项目组编:《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中体育的地位与价值》,2012 年版,第 135 页。

② 荣高棠:《开展群众性的体育运动是青年团的一项重要工作》(《群众文化工作是对青年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 1955 年版,第 43 页)。

③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工作综合报告》(1955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502。

④ 《本会关于文化宫、俱乐部、图书馆、文艺、电影、国际活动、体育和业余文化教育等工作报告和有关收费、组织领导、建立体协等通知、规定、条例及典型经验》(1955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502。

⑤ 《全市职工排球比赛大会今日开幕 从上午九时起共有二十三场比赛》,《北京日报》,1953 年 4 月 19 日,第 4 版。

⑥ 《苏联体育代表团明天在文化宫表演一场》,《北京日报》,1953 年 10 月 4 日,第 3 版。

⑦ 《文化宫举办工人体操干部训练班》,《北京日报》,1953 年 9 月 29 日,第 2 版。

1960年,由于处于经济困难时期,市民体育运动受到较大影响。市体委此时强调职工体育要因时、因地的开展小型、简单易行、消耗体力较少的活动。广播操、生产操因此成为市民的主要体育运动,在文化宫的主导下,北京体育学院、北京体育学校的师生深入23个工厂、企业和17个区属基层单位进行辅导,并结合不同企业,针对不同工种的生产特点,推广了10余种生产操,如在全市传播和推广机械、铸工、木工、印刷、钢铁、纺织、煤炭、搬运、司机和售货员操,以利于职工消除疲劳。1964年10月,在对32个工厂的调查中,职工参加广播操活动达80%的有12个,达40%的有6个<sup>①</sup>。

与如火如荼的宣教活动相比,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十七年间文化宫的体育活动同样卓有成效,体育的作用,不单在于改善人民的体质和进行身体重塑,更在于改善国民的气质和面貌。体育中不甘人后、奋勇争先的精神,激励着曾经被称为“东亚病夫”的中国人赶超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也使被西方视为“一盘散沙”的中国在体育中培养了集体主义观念,这显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强调的“共产主义”中有关集体主义的意识甚为贴近。因此政府通过开展市民体育活动,培养民族自尊心、国家认同感,拉近“国家政治”与“民间社会”的距离,进而塑造新社会公民,确实有其现实性。与过去相比,中国人的体质有了较大的改善,“为祖国锻炼身体”不仅是动员的口号,而且是实实在在的改变着市民的生活方式。在文化宫的带动下,北京市民的体育运动已成常态,大多数工厂、机关都建立了自己的篮球场、乒乓球台等,尽管20世纪50年代未受“自然灾害”的影响,市民体育活动的规模和强度有所压缩和降低,但其精神却早已深入人心,并一直传承至今。

丰富多彩的文体活动,在体现太庙转型后的功能与作用的同时,也展现了全新的国家叙事框架,奠定了新政权对古迹改造的基础。但随着古迹利用的深入与扩大,尤其是文化宫影响力的与日俱增,其转型后的困厄逐渐凸显。

### 三 博弈:古迹保护与革命利用的张力

太庙是我国现存最完整、规模最宏大的皇家祭祖建筑群,是古代最重要的宗庙建筑,堪称“天下第一庙”。在古代中国,皇家庙堂也是宫殿的一种特殊形式,一样要遵循一系列烦琐的伦理秩序。因此,作为文化宫的前身——太庙,其原始功能,乃为祭祀之地,其雄伟的大殿,茂密的树林,精致而狭小的宫门,只为突出皇家仪式的威严与神秘感。在历史上,太庙,包括社稷坛(现为北京中山公园),都属于皇家禁脔,非一般人所能涉足,因此其幽静和庄严的气质,是彼时的主要特征。

当太庙转化为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后,旋即成为市民、工人和社会各阶层集会与游乐的最佳场所,由于其毗邻天安门,紧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政治中心,同时又是劳动人民的乐园,其符号与象征意义自然彰显。因此欢快、愉悦甚至喧嚣成为此时的主题。

1950—1958年间,劳动人民文化宫每年都举办各类活动,参与人数几百万(见表2)。这无疑给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接待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和挑战:劳动人民文化宫在某日晚举办的电影晚会,“由于观众人数过多,场内秩序混乱,被迫中途停止放映电影。当天电影放映的影片是《八一体育运动大会》,这部影片是二轮新片,观众达一万多人,因文化园内树木很多,放映电影只能容纳四五百人,人多了就好些人的视线被树木挡住,看不见电影,所以大家都想挤到一个适当的地方去看,秩序非常混乱,有些小孩在里面被挤得直哭”<sup>②</sup>。

① 《北京市志·体育卷·体育志》,北京:北京出版社2007年版,第39页。

② 《文化宫举办电影晚会 应对观众人数适当限制》,《北京日报》,1953年8月29日,第2版。

表 2 文化宫历年来举办活动次数及参加群众人数统计(1950.5—1958)①

	举办活动次数	参加活动人数			说明
		买门票人数	参加活动人数	总计人数	
1950.5.1— 1950.12.31	595	未售门票	1 590 364	1 590 364	包括电影队演出 59 场 观众 301 000 人
1951 年	1 374	1 588 134	4 230 997	5 819 131	包括电影队演出 232 场 观众 324 665 人
1952 年	2 039	1 713 623	3 091 370	4 804 993	包括电影队演出 371 场 观众 402 395 人
1953 年	2 583	2 749 858	4 940 907	7 690 765	包括电影队演出 1 064 场 观众 1 097 482 人
1954 年	3 234	2 348 659	5 294 558	7 643 217	包括电影队演出 2 503 场 观众 1 966 381 人
1955 年	4 460	1 736 000	6 341 653	8 077 653	包括电影队演出 3 552 场 观众 2 756 544 人
1956 年	1 264	1 258 800	3 589 844	4 848 644	
1957 年	2 207	1 063 200	4 428 709	5 491 909	
1958 年	3 746	668 900	5 593 423	6 262 323	
总计	21 502	13 127 174	39 101 825	52 228 999	

随着活动的增加,每天出入劳动人民文化宫的民众数量很大。当时虽有 3 个门可以出入,但仍感不足,特别是南门,本来就窄,又因紧邻天安门,成为大部分游人的出入口,就更显得狭窄。每逢“五一”“六一”“十一”、新年、春节等盛大节日或其他较大活动时,南门常是拥挤不堪。市民要花很长时间排队,有时入门的人排到天安门桥前,出门的人排到树林中很远的地方。此外,许多国际友人和首长要从南门出入,也颇不方便。

为解决这些问题,劳动人民文化宫曾经提出:“为了便利群众出入,我们要求将文化宫南门在原有基础上扩大(为取得对称,中山公园南门也可同时相应扩大,中山公园也存在南门口狭窄问题),扩建经费希望由市人民委员会解决。”<sup>②</sup>由于文化古迹具有一旦破坏就难以恢复的特性,所以尽管文化宫狭窄的南门影响了市民的出入,可为了不改变文化宫原来的面貌,同时也是出于保护古迹的考量,此事并未成行,但从中却可以瞥见,作为太庙的原始功能与作为集会和游园的场所有一定的冲突。

由于文化宫还承载着教育及展示的功能,因此在革命利用及文物保护之间,同样存在着矛盾,这也使文化宫的建筑和宫墙经常面临被改造甚至拆除的风险。1953 年 2 月,在当时对外贸易部的组织下,东德机器等工业品在文化宫展览,但有一架机器体积过大,无法进出,于是围绕是否拆除宫墙,对外贸易部和文化宫发生了争论,各执一词:

(三)该机器尚未到来,是否真正进不来,尚难确定,而事先拆毁、动工、以及将来修复等,此笔费用不会小,万一白搭,如何报销。

(四)此次机器大进不去,可拆墙、拆门,假如再有更大的机器到来,也须在该宫展览,是否还要重拆重建一

① 参加活动总人数(人次)等于买门票入门人数及参加各项活动人数的总和,但买门票入门的群众有时也参加某些活动,统计时不易分开。1950 年至 1955 年举办活动次数和参加活动总人数中包括电影放映队下基层放映电影的次数及人数。1950 年因未售门票,入园游览人数无法统计,只有参加活动人数[《北京的文化馆》(文化宫部分)(1961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01-012-00870]。

② 《北京市委关于文化宫南门出入口问题的报告意见》(1957 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51-001-00047。

番？再假如说，有机器要进天安门内展览，如进不来，是否也“拆掉重修”。

(五)这展览是暂时性的，古建筑的保护比较是永久性的，似应该保护比较永久性的，似不该以永久性服务于暂时性的。

(六)据贸易部人员称，已经答应该展览会地址在文化宫三重院内，如改变地点，这于国际友谊有碍等语。但我们国际友人决不忍心为了展览而使我们古建筑受损害。同样我们如到德国展览，我们也不应该破坏到人家古建筑，恐怕德国也不肯(事实也不该)<sup>①</sup>。

通过此事，我们可以看出，当时一些机关单位甚至主管单位的文物保护观念相当淡薄，在没有经过考察和论证的情况下，因为一部机器就动辄拆除一段宫墙，却不考虑对宫墙的破坏，这在今天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但在那个年代却被视为珍重国际友谊的体现，反之则是破坏国际友谊。如果不是文化宫人员的抗辩和文物整理委员会的从中调解，文化宫门墙很可能遭受破坏，而一旦破坏，即使修复，也难免不对宫墙整体造成损害。这也再次凸显了作为集体活动的场所，文化宫并不一定适合，其广阔而封闭的空间、浮夸而高耸的宫墙，高大而茂密的树林，幽长而狭窄的石路，并不与文化宫职能的设定相吻合，甚至旨趣相左。

尽管在1953年文化宫的宫墙拆除的争论中暂时逃过一劫，但其改造和拆除还是不可避免，尤其是“大跃进”开始后，文化宫里的活动异常之多，宫内复杂和幽闭的宫墙很显然不利于市民游园和疏导，因此门墙等成为此时期改造的重点：

拆大墙：1956年拆除后河东头墙一道，1960年拆后河西头琉璃门墙一道，1960年拆除后殿东西两边大墙。

开大门或豁口：1953年开西北旁门，1956年在外垣北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后台门)。1959年在内垣西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的太平门及运展览品通道)，在外垣西北面开大门一个(作劳动剧场出口)。1960年在外垣北面开豁口两个(作通往三殿和各殿的通道)<sup>②</sup>。

直到1963年，文化宫被确定为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拆改现象才有所遏制。正是因为文化宫的原始功能与目前的“政治设计”旨趣相异，作为“古迹”的太庙与作为“乐园”的文化宫在渡过最初的蜜月期后，其不兼容的特征愈发明显，存在和暴露的问题也相当突出：

(1)由于各殿房经常举办展览会和其它活动，冬季需生火取暖，虽然有人管理火炉，但不能确保安全，而且生火时满屋黑烟，也有损古物。

(2)灯光路线全是明线，展览馆内的日光灯离假墙太近，一旦冒火，容易发生危险。院内线与大树磨擦，也很危险。

(3)由戟门至后殿院内的砖地面已破碎不堪，坑洼不平，与雄伟的建筑实不相称，而且行走很不便。

(4)避雷网的边沿全紧接檐瓦上，由于热胀冷缩的关系，部分檐瓦已脱落或松动。

(5)全部古物都无科学记录档案。

(6)保护古物的标志大部分已坏了，没有修整补充<sup>③</sup>。

尽管问题重重，但是文化宫繁重的展览与游园任务，使得文化宫无暇彻底解决上述问题，这也终于使多年的积弊爆发，1965年，由于年久失修，电线胶皮老化造成短路，文化宫琉璃门西侧展厅出现失火事故，展品与文物付之一炬，造成了相当严重的损失<sup>④</sup>。此前，文化宫儿童乐园同样因设备故障，造成了儿童在体育场伤亡的事故<sup>⑤</sup>。这其中既有管理不善的原因，更有设计与功能相悖的困扰，其存在的问题和隐患最终以令人遗憾的方式暴露出来。

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文化宫所凸显的问题既有代表性也有深刻的历史成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北京的古迹大多归属不同的单位(见表3)，对古迹的修缮、保护与利用，由所属单位负责，报请相关部门签批，但并无统一标准。作为文物古迹主管单位的北京市文化局，在此事上，权责也不甚清晰，相关的法规和条例，更无从谈起。“(文化宫)几年来迎合自己活动的需要，对部分古建筑，进

① 《关于对外贸易部在劳动人民文化宫展览东德机器等工业品，有一架机器体积过大，拟拆毁宫门墙问题》(195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011-001-00303。

②③ 《北京市总工会关于文化宫古建筑保护管理的情况、问题和意见》(196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1144。

④ 《文化宫展览馆失火事故检查报告》(1965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224。

⑤ 《文化宫儿童体育场伤亡事故向市委检查报告》(1961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0156。



行了较大的拆改,也增建了一些新的建筑,这对保持古建筑的原有风格是不利的。这些改建工程有些市文化局是知道的,有些我局并不知道。”<sup>①</sup>正基于此,各古迹所属单位在面临利用与保护的两难时,难免不以方便利用为先。1963年夏,北京市文化局发布了《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组织相关单位联动,力求从制度上完善古迹的保护<sup>②</sup>。但这显然姗姗来迟,此时正处于“革命风暴”的前夜,随后发生的诸如“四清”等政治运动将这种努力化为乌有。

表3 北京市皇家古迹所属单位名单(有删节)<sup>③</sup>

编号	名称	所在地	使用单位
1	天安门	东城区	天安门管理处
2	故宫	东城区	故宫博物院
3	天坛	崇文区	市园林局
4	国子监	东城区	首都图书馆
5	雍和宫	东城区	中国佛教协会
6	文化宫(旧太庙)	东城区	北京市总工会文化宫
7	皇史宬	东城区	中央档案馆
8	中山公园(旧社稷坛)	西城区	市园林局

#### 四 结 语

太庙的革命化转型见证了人民政府将其主义与意识形态逐步落地的过程。由杂草丛生的“古迹”到劳动人民的“乐园”,其转型的步伐是迅速而轻快的。阶级属性的改变,使得太庙失去了以往神秘的外衣。人民,成为了这座“古迹”的主人,我们已然发现市民是如何积极光顾这座昔日的皇家禁脔。因此,政府在改造市民思想与身体的同时,市民也乐于在闲暇之际参与其中。在文化宫宏大而幽秘的空间里,双方和谐相处,各取所需。

但“太庙”与“乐园”的博弈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十七年间持续上演,究其实质,却是“古迹保护”与“革命利用”间的张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些曾属于封建王朝的场所都被冠以人民的名义,改作他用,如国子监被改为首都图书馆,东岳庙为公安干校所用,皇史宬改为中央档案馆等等。这些原属于封建王朝、或为王朝提供服务的场所,在经过改造后,被贴上“为人民服务”的标签,成为全体人民公共活动的场所。这些翻转和变换,无疑是中央政府在向世人宣告人民当家作主的信息,这些封建王朝的象征,最终成为时代变迁的符号和注脚。尽管北京市相关部门和文化宫也在极力保护和修复古迹,但在时代潮流面前,“政治符号”的意义始终要大于“古迹”的认同。因此对古迹的改造甚至破坏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古迹的革命化利用,很大原因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初期百废待兴,政府无力兴建大型场所,而诸如太庙等正处于闲置状态,因此征用并改造也属无奈之举。

改革开放后,随着国家经济形势的好转,文物古迹的保护工作逐渐受到重视,北京市一批古迹被保护和还原,比如东城区文化馆就迁出了钟鼓楼,另觅新址。1988年,劳动人民文化宫也终于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其“古迹”价值和身份终于得到相应的认同和确定。文化宫也有意降低了市民活动的数量和规模,内部宫殿大多恢复原貌,祭祀礼器也得以归位,这不得不说是一种进步和自信。

① 《北京市文化局对市总工会“关于文化宫古建筑物保护管理的情况、问题和意见”的意见》(1964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1144。

② 《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196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1144。

③ 原为《全国和北京市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名单》,《北京市文化局对当前文物保护管理工作的意见》(1963年),北京市档案馆藏,档号:101-001-01144。

直至今日,在相当多的地区,文物保护与“政治利用”、甚至商业开发等之间存在的张力和博弈始终没有厘清,有些问题亟需解决。

收稿日期 2016-11-15

作者刘宇,历史学博士,中共沈阳市委党校党史党建教研部讲师,辽宁大学近现代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辽宁,沈阳,110036。

## Transition and Contradiction: Labor People's Cultural Palace in Beijing, 1950—1966

Liu Yu

**Abstract:** The Labor People's Cultural Palace in Beijing was originally used as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which was a site for royal sacrifices in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and a forbidden place for civilians. After the establishment of New China, this place was endowed with revolutionary functions, whose gist was to be “paradise for working people”. Since civilians from all walks of life were allowed to enter the palace, entertainment and political parades became the theme of the period. Endowing feudal state symbols with revolutionary function was meant to leave a strong symbolic mark, that is, to highlight that the ruling class had changed and people were currently the master of the country. As a cultural palace for working people, it not only became the materialized carrier and authoritarian symbol of New China, but was constructed as a space for public ceremonies. Meanwhile, as an ancient relic, the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was overwhelmed by frequent activities and constant tourists.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these two functions gradually stood out.

**Keywords:** Beijing's Imperial Ancestral Temple; ancient relic; cultural palace; revolutionary transition

【责任编辑 张秀丽】